

学做新闻杂志编辑的日子

曹景行

在《时代》杂志建立的新闻“生产流水线”中，研究员只是初级把关人。那时，记者发来的采访内容由撰述员统一改写，成稿后交编辑和分管不同领域的资深编辑多次修改，末了由副总编辑和校对员做最后修改，交总编辑审阅签发。做新闻周刊最要命的是截稿当日发生重大新闻，不得不更换上万字的封面专题，时间极为紧迫。但上述编辑环节一个都不能忽略，往往拖到深更半夜、口枯眼胀才能送印刷厂。

这种严谨的编辑程序，可说是知识劳力密集的高成本作业。有的报道如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刊发前还要再请公司内的法律顾问仔细审阅，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付印“出街”。即使如此，仍然难免出现大小差错，甚至被告上法庭判罚巨款。我在那儿打工的几年中，周刊就发生两起重大官司，都是在新加坡被起诉，也都是因为引述了错误的信息。法院判决诽谤成立必须罚款道歉，分别赔偿给对方九十万美元和一百五十万新元，金额真不算小。

第二起官司发生时，周刊已经换了老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代》集团与华纳电影合并为世界最大传媒企业时代-华纳，1994年调整资本结构把一直亏损的《亚洲周刊》卖给了香港《明报》集团。重组编辑部时，最大的变化除了把撰述员与编辑合二为一，再就是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只保留了两位研究员。另外，原来与《Asiaweek》共享的资料室连同几十万份剪报也留给了他们，新编辑部不再设立自己的剪报档案库。这样做一是为节约成本而缩小编制，再就是顺应数码科技对报刊出版行业的冲击。

三十年前我在香港开始新闻工作时，正逢印刷媒体由原先的铅字排版转为电脑排版。排字房消失了，好多几十年前就入行的老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有的只能改行去做大楼门卫当“看更”。对媒体记者、编辑来说，开始还可以继续用笔手写稿子改稿子，另有专门的电脑打字员帮你打稿。没过几年，编辑部里所有人都自己学会电脑写作，否则就难以继续任职。

接着又有更大的变化。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 internet 这词，最初连中文译名都不统一，也有叫“网际网络”的，后来才定于一尊为“互联网”。很快我就用上了，不仅可以及时接收新闻信息，查找资料更是方便。在编辑流程方面，各地的记者把电脑文稿直接传到香港编辑部内部网络，编辑完成后又经电脑直接送去排版。这样的作业流程今天早就成为常态，当时却是平面媒体的一场技术革命，一场残酷的生死淘汰。

互联网的另一次大变革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图片的品质，从此我们随时都能收到摄影记者和通讯社网上发来的高保真原图，电脑上选用后略加裁减立即就可以进入排版，完全取代了以前的“三色纸”。所谓“三色纸”是通讯社把新闻图片分解为三种原色，再分别用电传送给订户，我们收到后再把三色叠加恢复原图，质量往往很差，有些还可以勉强刊印，多数根本不能采用。也因为互联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好多报纸开始改成彩印，图片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少。

我们取消了研究员部门和资料室，取消了撰述员和编辑的分工，缩短了作业流程，让编辑承担更多职能和责任，有效控制了编辑成本。但从《时代》那儿学来的那种严谨作风，还是用心保存下去，也就是特别注重新闻事实准确和文字一丝不苟。

那七年编辑工作的“训练”，加上早先在上海社科院的七年研究工作，成为我后来做电视新闻评论的根基。当前新媒体繁荣兴旺，传统媒体扎堆投入融媒体，信息之庞杂远非我们当年能够想象。与此同时，有些新闻平台也变了味道，新闻品质更加不敢恭维，常常触碰专业底线，编辑中的低级错误更是时有发生。有感于此，写下上面这些陈年旧事供新一代新闻人参考；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担心，算是为过去留下几笔记录。

剑桥的书店，大小不一，各有各美。其中 G.David Bookshop 和 Heffers 两家，颇可一说。这不仅因为二者历史悠久，还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剑桥的邵洵美（1906-1968）与它们有“不解之缘”。在邵洵美笔下，这两家书店分别叫“老大卫”和“海法书店”。

在回忆录性质的《儒林新史》中，邵洵美以轻快幽默的笔调，分二十八回记述了自己海外游学一年多时间里，与文化圈内新知故交的相与往还。开篇第一回，就提到他 1925年初至剑桥被误认作徐志摩的经历：

“市中心有一片广场（笔者按：即 Market Square，现仍存），上面是各种的摊子。老大卫是这广场上的一个不朽的人物，他搭着个旧书摊子，三十年来不论寒暑，他总是笑嘻嘻地坐在那里。他看着年青的学子个个变成著名的文人，他知道每一个剑桥出身的诗人及小说家的身世。……他见到我总问我是姓许，或是徐，或是苏？他说在三年前有一个和我同样面貌的中国人曾经怀着要翻译拜伦全集的欲望回到他老家黑龙江去。”（《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如洵美自己所言，那时他“一个十八岁单身出洋预备读政治学的青年，对于中外文坛上的一名字是一般地陌生”，徐志摩是谁做甚一名不知，只是纳闷：难道世界上还有人与自己模样相仿，“也有一只长得像马脸的脑袋”？过了些时日，洵美因事去巴黎，才从徐悲鸿口

本文为 1984 年 9 月 4 日法国《解放报》上玛利亚娜·阿尔方在《情人》刚出版之际采访杜拉斯的文章，原题为《野性杜拉斯》，现被收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1962-1991 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一书，笔会获授权刊登，以饕读者。

这本该是一本相册中的几页配文，却成了玛格丽特的新书。湄公河畔的十五岁少女。她的《情人》洋溢着欢愉和金钱的气息。这是她所有故事的源头。写作重新开启。

玛利亚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是否可以說這本書來自一張從未被拍下来的照片？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来自一张没有拍过的照片，或者一个从未写出的文本，情人的故事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故事是我人生真实的故事，对我而言显而易见。这个故事，这段岁月，很奇怪，深不见底，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它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半。我描写的爱情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十五岁半。这份爱远远超出了我经历的一切爱情，超出了那些得到承认的爱、夫妻之爱。当语言走在事实前面，即便领先一点点，也是对事实的背叛，其间的距离会扼杀所有对这份爱的回忆。当人们刻意说谎时，就是把爱情扼杀在摇篮里。我们从来不跟对方表白。几乎一句也没有，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相爱的。我当时懵懂无知。至于他，我想，他最后明白了。明天我可以再写一本书，讲述我人生中缺失的这环。那本书大概会像别的书一样充实，像这本书一样，再写一百本也会同样充实。这么说纯粹是因为一旦有过如此强烈的现实体验，它就无法，虽然我不情愿，还是应该承认，无法用言语诉说。当爱情无法表白，它就有了身体的力量，可以充分享受欢愉的力量。应当从外部讲述它，不能进入，不能用别的方法。当我讲述这份爱时，我讲到了中国城，讲到了河流，讲到了白人的不幸，以及那里的天空。对爱情本身却保持沉默。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的家庭是如何搅和到这个故事里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通过金钱。那

译文

唯一的主题，是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玛利亚娜·阿尔方 黄荭译

时我总是要钱的一方。这跟付钱正好相反，不要混淆了。因为我身无分文，而他呢，他有钱。他口袋里装着大把大把的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家庭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把这些钱从他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的家人。这种需要如此迫切，必须首先满足，我是这么想的。没道理我去西贡最贵的餐厅吃饭，坐在配有司机的高级轿车里兜风，我母亲却在家里为了买肉而变卖家具。我要是没那么做才真是混账。不过与此同时，有些事情在我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这里面有隐藏的剧情，我给自己分派的角色不仅仅是需要帮助的人。我对他有了欲望，您明白吗，对这个情人，而他给我的是钱。他害怕白人。可他却给一个白人女子钱。不是给我母亲。而是给我。我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汇点。我筹划着一切。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的故事是您写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蓝本。您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史诗般的背景消失了。然而有一个这样的童年，谁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里，不再有殖民地。殖民地比比皆是。比起《堤坝》，《情人》更接近《副领事》和《劳儿之劫》，因为这些书参与构建了一种真实，一种由缺失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的真实。我在《堤坝》里采用了我母亲和哥哥们的视角。他们把我的情人看成怪异的、憎厌的对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殖民者，打心底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让这个黄种人混入我们白种人，他们“办不到”。……其中的差错，这里我想称之为意外，就是我自己身体，它享受

这个憎厌的对象。白人父母，他们不明白这点。如果我母亲知道了，或许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我向他们隐瞒了这种欢愉，就像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写作一样。他们觉得我不爱他，也因为这个，因为我给他们造成的种种痛苦而看不起他。

玛利亚娜·阿尔方：是什么让这个无法言说的故事变得可以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本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扬·安德烈亚的《玛·杜》。这本书很美，很震撼。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重新发现了我身上的野性，这种野性依然存在并且在《玛·杜》中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呈现。这本书帮助我回到自身。我一直想谈一本关于我的书。想把它写下来。读出来。《情人》，是本狂野的书。这次，我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我无法分享。假如我这么做了，我会错过眼前行驶的列车，错过这本书。我唯一带上车的是我自己，否则会丢失来时的线索。我就是这样写下了《情人》。写得很快。我觉得自己回来了。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我不再迷失，而是回到原点。我感到自己在写作。对于其他书，我想我一直在努力进入写作的状态。可这本书，我真的在写。我不再刻意寻找写作的感觉，而是自然地写出来。既然这本书开始离我而去，我发现我威胁到了现在书中常见的夸张的用词，它们总是让书显得沉闷和难以卒读。我想通过这第二本书回归自我。那些事我大概会写两三本书。自从认识了情人，一切都停留在那一年。对于写作，我后来经历的种种都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没完没了的童年。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是否承认《情人》是本小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人希望我把“小说”两个字放上去。我答应了，随后又翻悔了。我喜欢荒芜的空白。无论是否承认，说到底这是读者的事。阅读，就是小说。在读书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它会产生奇迹。我可以说：读完《克莱芙王妃》之后，我成了它的作者。这本书我一直没读懂。两年前我开始重读。它占据了我生命中两年的时光。从那时起，也是持续两年的幸福。《克莱芙王妃》打破写作的常规，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就像拉法耶特夫人追述的那样。她像追溯一条河流般追述那个故事。《情人》是本小说。它没有去处，没有主题。没有或多或少指明的方向。合上书，没有一个故事随之终结。情人的故事没有，哥哥的故事没有，天空的、旅行的、离别的故事也没有。这本书结束了。书的内容却不会结束，因为它们尚未被讲述。那座中国城中发生的爱情，那间屋子里流淌的欢愉，不是虚构的故事。它们就在眼前，活生生的。另一种阅读，不被观看，却更为深入。这些事您比我清楚。写这本书之前我感到恐惧。我心想：我要重写《堤坝》，这不可能。然后有一天写作的渴望超过了恐惧。我写出了《情人》。我写了一本全新的书。《堤坝》是另一本书，在我看来悲壮、崇高，可实际上它是讲述出来的。这本书不是。它是写出来的。唯一的主题，是写作。写作是什么？这条平行的路，这种从根本上对所有人、对自己的背叛是什么？这种终极的必然是什么？我见到别人总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次例外：人们不写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代替写作？所有的书都围绕相同的主题，写作。没有写作，就没有书。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的写作，是否是您提到母亲时所说的“流动的写作”：“她变成了流动的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我已经掌控了一切，让它们走上轨道。意思是我整个人随外界运转，与此同时，在文字的处理和事件的叙述中，杜绝任何特别的存在，无论它是什么。特别的是这个整体，而不是人们所说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是我本人，不是这份爱，不是我的哥哥。特别的是这一切，所有这些事，这个季节，这些感觉，奇妙的夜晚，痛苦，无知。无一遗漏。不多，也不少。地球在转动。当我提到我的情人，我没有说我再次见到他的脸，而是说我再次见到那张脸，想起了那个名字。一切由外界决定。由你们决定。我把他交给你们。今晚你们将因爱他而失眠。



筆會

跨文化的时空旅行者（版画）
阿克诺米杜弗洛朗蒂「希腊」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剑桥的“老大卫”与“海法”

刘群

主任、汉学家艾迺世（Charles Aylmer）先生的畅聊中，才偶然恍悟并确认：G. David，就是当年市中心广场老大卫的露天书摊退市入室呀！作为老剑桥，艾先生至为推崇 David，常常去淘书，我随口问一句，那相距不过几百米、全英大小镇常见的连锁书店水石（Waterstone's）怎样啦？老先生毫不犹豫直言告退：那个书店？不用去！

G. David 这家以创始人 Gustave David (1860-1936, 法国人) 命名的书店，始于 1896 年（这与上引洵美言“三十年寒暑”正好吻合），隐在国王学院对面圣爱德华小巷子里，不引人注意，内里却别有洞天。书店特制签名本的腰封，印有 Cambridge's Outstanding Antiquarian Bookseller（剑桥一流古旧书店）——料想不是哪家店都能如此宣言。其外间是普通二手书，文学历史，军事政治，好书多，价廉，一部 1904 年初版、1943 年第 23 次印刷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3.5 英镑即入手。狭窄通道进去，则是珍本书区。书都锁在透明玻璃橱柜里，如要试看，店员热情

取出递给你——一册由伍尔夫与丈夫伦纳德合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初版《到灯塔去》（Hogarth Press, 1927），两千多镑，摩挲一阵，虽不能有，眼界大开，足矣。

第一次去 David，是在听到一场关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与剑桥渊源”的讲座之后，寻觅一本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与拉弗拉夫夫妇：一种不同寻常的友谊》的书。讲者提到，该书 David 有卖，从中可以了解到：达尔文的孙女格温·拉弗拉，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早期成员与伍尔夫相识，伍尔夫去剑桥时即常住格温家。后格温因丈夫身体原因迁居法国南部的旺斯后，三人通信频繁友谊渐深，留下诸多令人动容的书信。

离开剑桥之前，特意又去一次，满满当当都是书的前台一角，赫然摆着格温回忆童年剑桥生活的畅销书 Period Piece: The Cambridge Childhood, 2014 年新版，精装小开本，拿起便不忍放下，像是默默收藏一段不欲为人知的秘密感情。临走，却从店员口中得知，一直由家族传承经营的 David，接下来将会转

入他手，因为下一代无人愿意承继了。

Heffers，则是洵美笔下的“海法书店”，坐落于一学院对面，也是老牌书店。店内楼梯拾阶而上，会看到侧墙醒目之语：The Great Cambridge Bookseller since 1876，呵，比“老大卫”还早二十年！1925 年下半年，一直沉醉于古希腊女诗人莎弗（Sappho，通译“萨福”，此为洵美译）世界不能自己的邵洵美，根据莎弗留下的五六十个诗作断片，加上自己的想象，写成一出短剧《莎弗》，由慕尔先生（按：洵美在剑桥的房东兼导师、三一学院院士）作介，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十年之后的洵美记忆仍然清晰无比：“这册剧本印得特别讲究，纸张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购转买来的手造纸，封面的图样又是英国木刻名家吉尔先生的设计”。（《儒林新史》）显然，洵美对此书十分用心，寄予不小期待。惜乎，当这本小册子摆到海法书店的陈列架之后，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年轻的邵洵美要因此“一举成名的确信”也化作泡影。但无疑，这是一个重要而珍贵的见证，洵美初探文学堂奥之执着痴迷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此书至今国内不曾见。为此，我曾专程往访存有 Heffers 书店档案的剑桥郡档案馆查阅，不巧恰逢该馆搬迁存档，只能看到网上目录，未获具体线索。洵美这唯一一剧作，是否会重现人间？而洵美与“海法”的这段“不解之缘”，是否有可解之日？期待重返剑桥亲查为实……